

诗经  
论译

ISBN 7-5347-1983-6



9 787534 719837 >

华 锋  
边家珍  
乘 舟

2022.2  
18

诗  
经  
论  
译

大象出版社

## 诗经论译

华锋 边家珍 乘舟

责任编辑 王笑波

---

大象出版社 出版

(郑州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)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.5 印张 406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 000 册

ISBN 7-5347-1983-6/I·79

定 价 30.00 元

# 序

白本松

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《诗经》全面地反映了从殷末周初到春秋中期这个漫长时代的社会现实，真实地描绘了上自天子诸侯、下至庶民奴隶的生活状况，生动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喜怒哀乐的感情，特别是它那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的创作精神，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，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。

实际上，《诗经》对后世的影响决不局限于文学的范围之内，它的影响要广泛得多。无论在《诗经》产生之初，或者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，它都不是作为纯文学的典籍而存在的。当年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以《诗》教弟子，是把它作为一部生活教科书使用的，要求学生从中学到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知识和本领，带有很强的实用性目的。到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在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的氛围中，《诗经》又被推上国家法典的地位，强加比附地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成了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。唐高宗颁《五经正义》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之后，下至清朝覆亡，《诗经》这种作为治国、教化“圣典”的地位，又得到了加强，影响日益加深，在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道德、伦理、思想、艺术乃至民风民俗等诸多领域

中,无不渗透着“诗教”的精神。因而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《诗经》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之大之深,在古代文化典籍中是罕有伦比的。因此,要想真正了解中国,深刻认识她的历史和民族的特点,《诗经》就是一部不能不读的书。

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,与此相应,文化也正在经历一个更新、重构的变革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切往昔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文化形态,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现代人们生活的重新检验,按照“适者生存”的原则,进行选择,决定取舍。无庸讳言,《诗经》在今天业已失去了往昔作为“圣典”的意义;但作为一种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,还依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。这一点,下面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:近年来虽然出版了众多的《诗经》的注本、译本和选本,却仍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,无论在书店或是书摊上,要想买到一本《诗经》,殊为不易。所以如此,究其原因,除了人们对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热爱之外,《诗经》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艺术魅力,使它具有永恒的价值,才是最根本的。

华锋等几位同志,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对“诗经学”功夫尤深。他们通力合作,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,对《诗经》全部作品又做了新注、语译和评析,并依汉语拼音方案给原文逐字标出读音,甚便读者,这就大大地扩大了读者层面。我想,如果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从事这种工作,那对进一步普及古代文化知识,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,促进精神文明建设,肯定会大有裨益。

我相信,作者们精心编写的这本《诗经诠译》,是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的。

1995年9月

于河南大学

# 写在《诗经论译》出版之际

曾广开

## (一)

《诗经》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，先秦时期又称作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。自春秋末期孔子以《诗三百》教授门徒后，《诗三百》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，汉人视其为经典，尊为《诗经》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《诗经》既是封建知识分子科举、仕宦的必读书，也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。程千帆师在《詹詹录》中说：“汉以前的群经子史，是中国古代一切学术的源头。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如果对这样一些经典毫无了解，对在这样一些经典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及其作品，也就很难读透。”《诗经》是先秦、两汉典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，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也最为深远，近现代学者莫不视其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，研究著述不厌其多。华锋、边家珍、乘舟三位先生有感于《诗经》文字难识，旧注又不尽如意，别具慧眼，通力合作撰成《诗经论译》一书，使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所借鉴，又可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人学习的基础，其有益于艺林自不待言。

## (二)

《诗经论译》的体例对于初学者颇为有利。除原文外，每首诗

都有注音、译文、评析、简注，繁简适宜，便于读者学习。

《诗经》的读音，随着古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，先秦时期的读音实难求。尽管当代出版的有关《诗经》的注疏本常常强调某字古音当读作“某”，其依据者莫非汉代以后的旧注，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古音。所以，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采用较为变通的方法，一般以今音为主，兼顾古音。同时，直接注音的方式既有利于初学者诵读，又省去了注释中对古音的繁琐推求。当然，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，就是无法体味出《诗经》用韵的精妙之处。因为古今音读法不同，用今音来读，《诗经》中有些篇章好像是没有韵脚。不过，两者相比较，利大于弊，读今音更有利于读者的掌握。

《诗经》的译文，历来是注释者关注的重点。有人以信达为宗，认为诗无法翻译，强调《诗经》的译文要贴切明白。有人强调雅致，认为《诗经》是优美的诗歌，必须译成优美的诗句。鱼肉熊掌，不可兼得。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他们采用浅近的语言，以直译为主，以意译为辅，略加个别的衬字，写成节奏、韵律极佳的七言诗，韵味悠长，既保存了《诗经》诗体的特点，又准确地阐释了《诗经》的诗句。如《小雅·鱼丽》首章“鱼丽于罟，鲿鲨。君子有酒，旨且多”四句，质朴无文。作者译为：“篓中鱼儿蹦得欢，鲿鱼鲈鱼盛满盘。君子家有飘香酒，甘醇清冽一坛坛。”神采顿出，既准确传达了原来诗句的意思，又像是经过重新创造的艺术珍品。

《诗经诠译》的评析颇具功力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。作者往往结合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、风俗人情来解释诗歌的主旨，清除汉儒及后人《诗经》的种种误会和臆说。特别是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，探本寻源，指出《诗经》中诗篇对先秦儒道等学派形成的思想影响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，要言不



烦，立论精审。如作者指出《柏舟》诗所用手法实即屈原《离骚》“香草美人”手法之所本，其诗具有深沉之忧患意识，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再如作者结合先秦民俗对《绸缪》《东门之枌》的解释，言简意当，令人心折。同时，为了帮助初学者学习《诗经》，作者在评析时也注意分析其篇章大意和艺术特色，以求雅俗共赏。

由于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很好地解决了《诗经》的读音和章句大意，其注释就采用简注形式，不做过细地考辨，而是对旧注择善而从，断以己意，使之成为《诗经诠译》中注音和译文的补充。显见作者是有意识引导读者去精读原文，提高修养。

### (三)

《诗经诠译》的三位作者俱为学有专长的文史研究者。华锋先生乃先师华钟彦先生季子，自幼随父习读《诗经》。边家珍、乘舟两位先生乃我同门学兄，对《诗经》颇有研究。先师钟彦先生曾撰有《诗经汇通》(未刊稿)一部，精义迭出，用以授徒。华锋、边家珍、乘舟三先生所撰《诗经诠译》，实际上是运用《诗经汇通》的研究成果对《诗经》进行诠释和翻译，便于一般读者学习。我恳切希望三位学兄能再接再厉，将先师钟彦先生的《诗经汇通》整理出版，完成其未竟之事业，流惠于后人。我翘首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1995年9月  
于开封贡院碑旁

## 《诗经》臆语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 500 多年的 305 篇作品，在先秦典籍中只称《诗》或按其诗篇的约数称《诗三百》、《诗三百篇》，《诗经》是汉儒把它尊为经典后的称呼。

《诗经》是部重要典籍，一问世便受到时人的重视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引《大雅·既醉》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这是最早引诗的记录。孔子开学习、研究《诗经》之先河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有：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。”开称《诗》为经的新时代。到了战国末年，荀子已将《诗》列为诸经之首，倍加重视。但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都是私书，只能代表一家之言。直到汉宣帝时，“诏诸儒讲五经同异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，上亲称制临决焉”（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），《诗》被钦定为经典著作，《诗经》这一称谓方由政府正式确定下来，并相沿至今。与此同时，《诗经》也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吸引了无数文人学者去研究和探讨，开创了《诗经》研究的新纪元。经学家们把它作为教化的工具，政治家们把它当作改革的旗帜，史学家们要在它那里找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依据，思想家们则要从探索前人的思维模式与规律，文化学家们要研究 2000 多年来风俗民情的嬗变与发展，文学家们要从诗篇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创作，语言学家们要依据它对上古音韵加以考证，博物学家要搞清书中那些草木

鱼虫飞禽走兽是什么纲类。《诗经》成为一座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化艺术宝山，引起不知多少文人学者去攀登，甚至由此产生了“诗经学”、“诗经研究史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古往今来，没有任何一部诗集，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，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的原因，但与作品本身亦有极重大的关系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对《诗经》的认识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上了一个新台阶。我们开始以哲学、宗教、美学、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部古老的诗集，以纯文学的角度去翻检这部诗集，我们认为，这部典籍不仅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精华，更是打开我国人民审美观念、道德观念、宗教观念、思维模式形成之谜的一把钥匙。梁启超先生说：“现存先秦古籍，真贋杂糅，几乎无一书无问题，其真金美玉、字字可信者，《诗经》其首也。”（《要籍解題及其读法》）可见，普及对《诗经》的了解，藉以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，探索《诗经》在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，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，是十分必要的。这就是我们编写《诗经诠译》最原始的动机。

关于《诗经》文本及与此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、文化背景，前人研究多矣。我们不主张对文本进行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研究，也反对进行繁琐主义的考证，更不准备用已发生的历史事实来证实诗篇所反映的内容，只企图将诗篇所反映的真实面貌告诉读者。而在此文中，对若干热门课题稍加叙述，以使读者能获得一个完整的认识。

### 一、关于《诗经》的分类

《诗经》分为风、雅、颂三类，这在《周礼·春官》中就有记载，但对分类依据的认识分歧很大。诗序认为是从思想意义的角度划分，朱熹认为是依据作者之不同而划分，亦有认为是依据作品内容之不同而划分的。众说皆有偏颇，较为接近事实真相的是音乐

说：风诗为乡土之音，即诸侯所辖地域的地方俗乐；雅诗为朝廷之音，即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音乐；颂诗为宗庙之音，即宗庙祭祀时的舞乐。与此相类似的是乐器说，即风、雅、颂之不同在于演唱时使用的乐器不同。章太炎先生《大雅小雅说》认为：雅是一种类似鼓的乐器；张西堂先生《诗经六论》认为“颂”与“镛”通用，镛即钟，钟则是人们常用的乐器；郭沫若先生《甲骨文字研究·释南》认为：“南”即“铃”，铃也是一种乐器。由此郭老提出：“《诗》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大小雅，揆其初当以乐器之名，孳乳为曲调之名，犹今人之言大鼓、花鼓、鱼琴、筒板、梆子、滩簧耳。”这个看法很精辟，它进一步证实了《诗经》分类音乐说，正因为诗的分类依据是音乐，所以才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伴奏。

## 二、关于“二南”的争论

《诗经》国风分为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。争议较大的是“二南”。“二南”是周公、召公的封邑，不是封国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有：“其在成王时，召公为三公。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；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。”故王夫之《诗经稗疏》说：“盖周公、召公分陕而治，各以其治登其国风。则周南者，周公所治之南国；召南者，召公所治之南国也。北界河洛，南逾楚塞，以陕州为中线而分之。”今三门峡市博物馆尚存周召分界石，那斑驳的石柱，仿佛是一部无言的史书，记载了流逝的岁月，记录了宗周王室的兴盛与衰亡，令人神思遐想，不能自己。因为“二南”名称与十三国风有异，“南”又是一种乐器，《论语》仅提到过周南、召南、雅、颂，未尝提及风，故前人多有主张“二南”独为一体的观点。包括程大昌、顾炎武、崔述、梁启超等大家皆是如此。此说疏漏甚多，高亨《诗经简述》一文说：“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：‘风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。’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都是《召南》的一篇，可见，《左传》作者认为
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属于风。《周礼·大师》、《礼记·乐记》、《荀子·儒效》论《诗》，都是风、雅、颂三类并举，而不及南。可见《周礼》作者、《乐记》作者和荀卿都认为《诗经》只有风、雅、颂三类，南属于风，不是自为一类。”这已基本阐明了“南”非一体之说。而且就“二南”本身讲，其作品反映妇女劳动、婚嫁、归宁、思夫等主题的有 17 篇，占二南总篇数的 68%，与十三国风差异不大。二南虽大量使用虚词，仅“兮”、“矣”、“之”出现的篇幅就占全部作品的 56%，但这与郑风相比，仍有逊色。在 25 篇诗作中，有 24 篇使用了重章叠句的篇章结构，与十三国风诗篇的结构也基本持平。可见从思想到艺术，二南与十三国风均为一体，而不应将其独自标出。

### 三、关于《诗经》的作者

《诗经》的作者，诗序已“认定”了许多。某公、某侯、某王、某妃之作，比比皆是，这种论断，我们自然难以苟同。依我们看，确定诗的作者，首先要取得内证，其次得依据《左传》等史书，不能想当然。依我们看，《诗经》的作者能确定的有 6 篇。《邶风·载驰》为许穆夫人所作，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有许穆夫人赋《载驰》，且诗与史合，故可认定。《小雅·节南山》有“家父作诵，以究王讟”，可认定家父为该诗作者。《小雅·巷伯》有“寺人孟子，作为此诗”，可认定寺人孟子为此诗作者。《大雅·崧高》有“吉甫作诵，其诗孔硕”；《大雅·丞民》有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”，故可认定此二诗的作者为吉甫，即宣王时代的尹吉甫。《鲁颂·閟宫》有“奚斯所作，孔曼且硕”，可以认定此诗为奚斯所作。以下 3 篇的作者也基本可以确定，或至少可以作为一说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载：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，曰‘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’”，故《小雅·常棣》的作者为召公虎。《国语·楚语》有：“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，犹箴儆于国……於是乎作《懿》戒以自儆

也。”前人以为“懿”、“抑”相通，故有《大雅·抑》之作者为卫武公所作一说。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有：“周芮良夫之诗曰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’”此诗为《大雅·桑柔》第十三章，故此诗作者可认定为芮良夫。此外，传统说法认为《小雅·小弁》为太子宜臼所作，《小雅·白华》为申后所作，《大雅·江汉》为召虎作，《商颂·殷武》为宋襄公作，虽无具体实证，但诗序以降，多有从之，亦可备一说。除此 13 篇，其余的 292 篇诗歌作者难以详考，在没有新的理由和充分的证据之前，暂作存疑为好。

#### 四、《诗经》的成书与推广

一部诗集，时间上下绵延 5 个多世纪，作者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员，作者足迹遍布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、安徽等广袤的土地，在语言、文字、音韵尚未统一，交通、信息极不发达，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，这部语言统一、音韵一致、结构完善的诗集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周太师。周太师——这些优秀的诗人兼音乐家们，首先是搜集诗，然后用统一的音韵、文字去改造诗，最后将它推广出去。没有他们的努力，便没有《诗经》的今天。关于诗的搜集，前人有采诗说和献诗说两种。《国语·周语》、《国语·晋语》、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均有献诗说的记载，白纸黑字，毋庸置疑。采诗说主要见于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引《夏书》佚文，《孟子·离娄篇》也有隐约的记载，此说后世虽有许多相左的意见，但亦可基本确立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没有任何个人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，只有通过权力机构，才能完成大面积的搜集工作，然后加以筛选、加工、润色，并推广出去。以往，人们对搜集诗十分重视，以

为这是满足统治者燕飨，充当教育贵族子弟教材以及了解民情的需要，事实上，搜集、整理诗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广诗，推广诗的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王室与地方的紧密联系，强化王族的统治。众所周知，周王室为了有效地统治各地，曾大封诸侯，让那些与王室有密切血缘关系的贵族们、那些立有军功的臣子们代表王室去管理地方。为了保证这些被封到各地的贵族不为各地的方言、不同的习俗所“异化”，王室通过诗歌，用统一的语言、文字、音韵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，用代表王室思想的作品去统一各诸侯国贵族们的政治观点、审美意识、道德情操及宗教信仰等，也就是说，诗被用来作周族加强内部联系的粘合剂，成为周人维系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。《礼记·乐记》有：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；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”可见礼是用来区分君臣上下、亲疏贵贱的；乐是用来团结内部、使之相亲相爱的。自然，乐并不等于诗，但乐与诗有密切联系，尤其是在歌、乐、舞三位一体的时代，关系尤为密切。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，《诗经》大约是首开其例了。

### 五、孔子与《诗经》

孔子是第一个将《诗经》选作教学内容的教师，又是第一位研究《诗经》的大师。他精辟地提出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“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……一部《论语》，竟有 14 处言及《诗》，孔子真正领会了《诗》的精髓，他从诗中领会到周人端庄方正的理性精神，从《诗》中悟出了中和之美的本质特征，更从《诗》中提炼出美刺的讽谏意识，对《诗》的研究，他已完全突破了文学的藩篱，而是立体地、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地俯视与研究《诗经》。多年来，人们习惯于围绕着孔子“删诗说”成立与否争论不休，其实大可不必。因为《诗经》成书是一个漫长的

过程,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便有引诗,而此时《诗经》中的许多诗篇尚未问世;《论语·八佾》有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”,今本《诗经》便无最后一句;《荀子·天论》引《诗经》“礼义之不愆,何恤人之言兮”,今本《诗经》无此言。可见从鲁隐公元年到战国末年,《诗经》作为一部典籍,始终处于一个流动状态,处于一个不断更新、补充、删节、完善的过程。孔子作为参与这一活动的重要学者,理所当然应受到重视,研究孔子对《诗经》的认识与评价,尤其是研究孔子从《诗经》中汲取精华,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——儒学的过程,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哲学、宗教、文化、思想的发展与流变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## 六、《诗经》的大序与小序

毛诗学派能取代三家诗,诗序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,读《诗经》必须研究诗序,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。两宋之前,诗序的确是金科玉律,无人敢于质疑。宋人以大胆的、创新的目光审视以往的一切,诞生了以欧阳修为首的疑序派,朱熹成为集大成者。两宋之后,存序派、废序派唇枪舌战千余年,可谓难解难分。对此热门话题,我们认为,首先,诗序的作者问题,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:“宏从曼卿受学,因作《毛诗序》,善得风、雅之旨,于今传于世。”此说历来有疑问。近年来安徽阜阳出土了西汉汝阳侯夏侯灶的墓葬,其中有《诗》之简片 170 余条,且有诗序,尽管文字略有出入,但体例与序旨基本相同,可见诗序至少产生于西汉前期,不可能是东汉卫宏所作。其次,大序小序的划分,本是极简单的问题,结果让经学家们搞得神乎其神。我们认为,《关雎》篇前面的一大段文字应为大序,每篇前面类似解题的文字为小序。但大序又与《关雎》篇的序夹杂在一起。即从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”开始,至“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”为《关雎》小序的前一部分,再从“是以《关雎》乐



得淑女”至结束，为《关雎》小序的后一部分，两部分合在一起，即《关雎》篇的小序。中间的一大段，即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……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”，为诗大序。至于大序为何套在小序之中，便不可得知了。第三，诗序存废之争的本质是要以自己的观点来解释《诗经》，以获得学术上的领导权。但这一斗争在客观上打破了毛诗学派独步天下的事实，促进了《诗经》研究，这倒是争论者所始料不及的。最后，我们认为，诗大序以总结《诗经》创作经验为中心，概括并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歌的认识，就诗歌的基本特征、社会作用、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尤其是其美学思想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李泽厚先生称之为“东汉儒家美学的一篇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”（《中国美学史》），所言不虚。

### 七、《诗经》的思想与内容

《诗经》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，全面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周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及社会生活。为更好地阐述这一问题，我们从《诗经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周代社会的思想意识两方面论述，以证实《诗经》内容之博大精深、包罗万象。

首先，我们认为《诗经》全面反映了周人的劳动生活，农耕、蚕桑、采摘、纺织、染色、建筑、狩猎、捕鱼、缝纫、搓绳、修缮、畜牧，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在这些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中，不仅反映了劳动是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，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第一创造者，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劳动的热爱及贵族统治者对劳动的偏见（如二雅中仅有反映狩猎和畜牧的诗篇）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通过对反映劳动生活诗篇的研究，可以全面认识周代生产状况、产品的分配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，有助于我们了解周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。

第二，《诗经》反映了周人的爱情、婚姻及家庭生活，对于我们